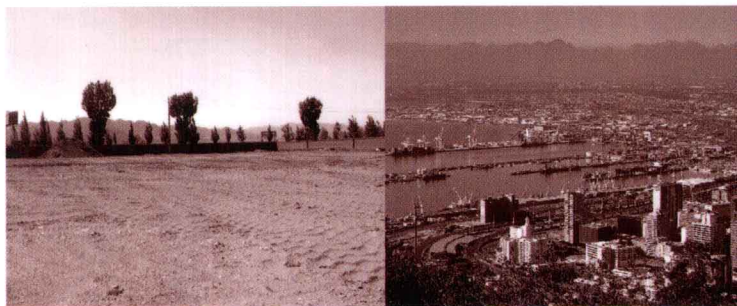




Land Proble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n

土地问题 与南非政治经济

孙红旗◎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nd Proble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n

土地问题 与南非政治经济

孙红旗◎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 / 孙红旗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17-0965-3

I. ①土…

II. ①孙…

III. ①土地问题—研究—南非(阿扎尼亚)

IV. ①F347.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9634号

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最近孙红旗教授请我为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作序，我欣然应允：一来我自觉在他所研究的领域确实有些发言权——我研究非洲历史数十年，也算有些心得，正好有感而发；二来“徇些私情”：他在北京大学攻读六年，成绩斐然，算是我的高足；三则确实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十年磨一剑”，毕竟大不同，坐得冷板凳，功到自然成。

众所周知，南非是著名的“彩虹之邦”，它和东非地区一样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迄今仍然保存完好的科伊桑人岩画证明了广袤的南非次大陆有着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但自公元16世纪起，欧洲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南非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数不多的欧洲殖民者，主要是荷兰人、英国人陆续登陆好望角，进而翻过桌山，向北直达林波波河，向东进至印度洋西岸，最终鸠占鹊巢，将南非1 221 037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而占人口87%的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则被圈进贫瘠的保留地，即所谓的“班图斯坦”，或称“黑人家园”。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通过颁布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当政的阿非利卡人以严酷的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畸形的现代化，南非成了“白人的天堂，黑人的地狱”。

西方有学者称欧洲人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在非洲历史上只是一段“插曲”，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维持的时间也不算太久。但原住民被剥夺土地的历史却对南非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4年，南非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了过来，被囚禁了将近28年的曼德拉从罗本岛的牢房走进了一直由白人把持的总统府，并成为那里的主人。

然而政权的易手并不能完全改变南非的三个半世纪白人统治历史所

形成的现实：白人仍然控制着南非绝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南非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仍然充满着许多变数或未知数，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言：“自由路漫漫。”

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孙红旗教授的著作《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多维角度，通过跨学科研究，对此给出了自己系统而完整的答案。

孙红旗教授从事非洲的历史研究已近20年，其中6年是在北京大学跟随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本书即是他在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当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尽管我和导师组的其他几位先生都希望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3年耕耘的成果付梓，但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难得的耐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作品。2006年，他远渡英国，在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潜心搜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并与国外非洲学界同仁进行交流，为书稿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孙红旗教授的书稿《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又经过3年多的认真推敲，2011年交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于是读者们的面前便见到了这样一本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我国南非史学研究空白的新作。

理解纷繁复杂的南非历史，关键在于抓住南非历史发展的三个生产力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像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6页）。孙红旗教授的著作紧紧抓住“土地”这个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过程及其和劳动力、资本的互动关系，也即如书名所言，即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一部白人与黑人争夺南非土地的历史，就是整个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史。

除去“彩虹之邦”斑斓的外衣，其实南非的民族构成主要是对比鲜明的两色——黑人与白人。《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当然并不局限于黑白两色，因为南非土地问题形成的历史并不是那么“一清二白”，而是有着许多非常规的内容。在孙红旗看来，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并非那么“规律”，不能按照一般殖民主义史的逻辑来解释。事实上也是如此。有许多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最后形成的种族主义藩篱，最初要隔离的其实是阿非利卡人自己。因为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并未想深入南非内陆数千公里，而只是想把好望角变成有“海上马

车夫”之称的荷兰人大洋航线上的一個补给站而已。他们并不愿意冒险与原住民建立不确定的贸易关系，既无野心也无实力把南非拓展成帝国（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块殖民地。

然而好望角的风暴却阻挡不了越吹越猛的贸易风（Mosoon）。尽管奔赴南非的白人移民从未形成潮流，尽管粗放经营的“布尔人”的生产方式并不比原住民高明多少，为数不多的东印度公司雇员还是变成了自己坚决声称的 Afrikaner（阿非利卡人，意即“非洲人”），他们脱离了祖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语言，建立起了自己的“共和国”，进行了浩浩荡荡的“史诗般”的民族大迁徙（The Great Trek），并与英国人打了列宁所称的第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又从战胜者手中接管了整个南非。这一切看似出人意料，却又有许多“必然性”。

《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的贡献在于，作者对这一切乱象给出了深刻而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置身于黑色汪洋大海中的阿非利卡白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像以色列人那样自命不凡，并且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凌驾于广大黑人民众之上，成为南非 12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者，自有其超乎寻常之处。他们既是一般的殖民者，又不是一般的殖民者。说他们是一般的殖民者，是因为他们和其他殖民者一样，都是到海外掠夺财富的欧洲人；说他们不是一般的殖民者，是因为他们与其他殖民者相比有其特性——阿非利卡人的祖国荷兰，是个向大海索田的狭小的低地国家；他们的祖先在向大海争取空间的同时，还为了民族和宗教的自由同西班牙人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们对土地和自由的理解和感受近乎狂热而偏执。

他们获取了土地，他们赢得了自由。作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了南非。这是一片与他们的家乡迥然相异的土地，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蹲守好望角，为过往船只提供淡水、蔬菜和肉类等。他们是优秀的农夫，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受到公司的控制，他们的发财梦并不容易实现。

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以租借农场的名义扩大了农牧场的范围，并偷偷地与科伊桑人进行贸易。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他们成了“本土化了的殖民者”。他们增值财富的行为势必与原住民——最初是科伊桑人，然后是班图黑人——发生冲突。当后者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的行为变成了掠夺。然又诚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南非大草原主要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使得擅长农艺的布尔人似乎“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只能屈

服于大自然，他们需要土地来蓄养牲畜，需要劳动力来放牧和管理牛羊。在南非的条件下，尽管他们与原住民相比并无优势——无论是在生产技艺还是人数上，但他们拥有屡试不爽的“三件宝”——圣经、牛车和火药枪。虽然他们事实上已经沦为南非大草原上的“白人部落”，成为非洲大地上的“欧洲文明碎片”，但他们在土地扩张的初期，基本上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尽管他们与祖国几乎断绝了联系，却有一条线把他们与欧洲连系在一起，即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而这也是他们呆在南非并能够获取财富的前提。当他们离开普港口越来越远的时候，说明他们与外部市场的关联越来越远。开普港口风帆云集的时候，正是他们财源滚滚的时候。

当然，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当地原住民的反抗。但在与原住民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已经变得很强大，“无主土地”的法理观念、种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极端自由主义的行为哲学，成为他们强大的精神武器，他们几乎消灭了桑人，役使了几乎全部的科伊人，将黑人不断向东、向北驱赶。

正当阿非利卡人在“开普东部边疆”向黑人步步进逼的时候，英国人闯了进来，接管了开普。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按照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向开普殖民地输入了数以千计的移民。尽管在南非垦殖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但英国人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还是对南非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遭致阿非利卡人的反抗。由此在南非上演了一部所谓的“民族大迁徙的史诗”。数以万计的布尔人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撤离开普殖民地和“东部边疆”，开始了向北向东的迁徙。不管怎么看待布尔人大迁徙的性质，其结果是，当他们最终到达林波波河南岸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属于班图黑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一过程中，1838年的“血河之役”更多地具有了象征意义：12月16日既是阿非利卡人的民族纪念日，也是祖鲁人反抗侵略的“丁干日”。阿非利卡人在班图人的家园上建立起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共和国”。

此时布尔人的土地扩张行为变本加厉，其驱动力不仅是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贸易，而更多是大英帝国的“推力”和班图黑人的“阻力”。为了应对这两股力量，处于人口劣势的阿非利卡人试图极力保持民族与阶级的同一，尽可能地延迟阿非利卡人内部的贫富分化。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唯一的和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为“贫穷白人”提供充足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源泉无一例外地必须从班图黑人那里获取。

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南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围绕价格飙升的土地资源的争夺。争夺不仅一如既往地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展开，同时也在白人民族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自从英国移民陆续有规模地、成批地来到南非之后，尽管他们与布尔人一样没有在农业领域大有作为，但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在南非大草原上充分显示出了其雄厚的实力，他们在与布尔人一道打败黑民族的同时，与布尔人的冲突也因“两矿”的开采而骤然升温，直至双方兵戎相见。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非洲最大规模的近代战争以其惨烈程度而著称，双方几乎动用了所能调动的最大军力，其结果也充满了戏剧性。布尔人从战胜者英国人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赔偿金”，并且在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之后不久又从英国人手里接管了政权。布尔人输掉了一场白人之间的战争，却获得了整个南非，获得了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绝对统治权。从此，阿非利卡人便为所欲为，不断用法律手段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的颁布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一夜之间，绝大部分世代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南非黑人从法律上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此后，类似的法律层出不穷，不断“完善”对黑民众土地资源的剥夺机制。阿非利卡人最别出心裁的发明，当属设立“班图斯坦”并最终让“黑人家园”在南非境内“独立”。又仿佛一夜之间，南非绝大多数民众忽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南非人，而成了南非境内的外国人。他们被“独立”了，却无法支配自己的资源和命运。

绝望至极中，他们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依靠种族隔离制度保障建立起来的畸形的经济繁荣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种族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90年代初，变革之风终于吹动了曾经“铁板一块”的阿非利卡人政府。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双方都在追求博弈的最大效益。几经反复之后，出现了和解的曙光。伴随着曼德拉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伴随着制宪谈判走上正轨，伴随着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以及曼德拉的顺利当选，南非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奇迹：三个半世纪的黑白对立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的内战，而是相对平静的和平过渡。曼德拉和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新南非从此诞生。

.....

孙红旗教授以土地问题为主线，很好地阐释了21世纪之前南非的历

史。进入新世纪以来，摒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充满了生机，然而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面临着现实的考验，其中就包括在土地问题的解决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健康、持续、和谐地发展的问题。期盼《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的作者继续关注该领域的进展，并适时作出理性总结，正如他现在已经做过并且做得很好的工作一样。

最后还应提一下这本著作的其他几个特色。在我所读过的史学著作中，能以近乎文学的笔触来论述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见，孙红旗教授的《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最引人入胜的还是其独到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阿非利卡人土地扩张行为的思想根源时候，颇有一些“心理史学”的意味。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值得国内学术界提倡的。此外，作者不仅文字功底深厚，表述生动，把严肃的史学著作写得极具可读性，还用心从各种媒介包括公开的互联网资源中用心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图片和图表资料，使得该书图文并茂，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个方面。

以逾古稀之年，品评一位后学之辈的力作，不知当否，也请同仁和读者们指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郑家弘

2011年3月2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目

录

序 言	郑家馨 1
绪 论	1
引 言：南非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11
第一章 殖民者与原住民土地观念的迥异	17
一、“无主土地”	17
二、“白人至上”	31
三、“极端个人主义”	39
第二章 阿非利卡人与科伊桑人和黑人民族经济结构的趋同	43
一、自然地理条件	43
二、大牧场经济结构	47
三、财产继承制度	51
第三章 阿非利卡人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土地问题	57
一、从人口经济学到人种经济学的转变	58
二、“拜旺纳”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方式	64
三、“贫穷白人”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68
第四章 贸易、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互动循环	71
一、贸易与土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	72
二、土地扩张和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循环	85

第五章 英国人的“系统殖民”与布尔人的“大迁徙”	97
一、英国人的“系统殖民”在南非大草原上的变奏曲	98
二、农地制度改革措施令布尔人撤出开普殖民地	104
三、“第五十号”法令和“释奴法令”迫使布尔人举家逃离 ...	109
第六章 “分别发展”：保留地和“黑人家园”的实质	117
一、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及其动因	117
二、“分别发展”的基础：《土著土地法》与“保留地”	121
三、“分别发展”的最高阶段：“黑人家园”的设立	136
第七章 白人的政治经济困境与种族隔离政权的瓦解	145
一、白人南非的经济困境	145
二、黑人的抗争与国际社会的抵制	148
三、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	155
结 语	159
附录一 1913 年《土著土地法》主要内容	165
附录二 南非土地问题大事记	173
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93

绪 论

南非是世界上问题最多、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因为她的历史和现实中几乎汇聚了当今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所有主要的矛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殖民主义的侵略、种族主义的强权、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等，而且都极具典型性。现实中，殖民主义的侵略早已结束，种族主义的政治强权统治也于1994年随着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公平的大选和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当选总统而走到尽头，但新南非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举步维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遗留下的障碍一时难以根除。要理解南非的现在，就要了解南非的历史。

南非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关于南非农民的地位及其经济活动，许多历史学家从历史上进行了考察。麦克米伦（Macmillan）、基韦特（de Kiewiet）、马雷（Marais）等人的著作中都对南非黑人农业的兴衰进行了说明，他们一方面强调是白人统治的毁灭性影响，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对土地的突然剥夺，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解体，以及原始民族经济的脆弱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落后，无法面对更为先进的商业化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非洲土著的农牧经济无法维持下去。基维特和麦克米伦都指出，失去土地对“部落经济”^①或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个沉重的打击，没有可耕地，部落经济也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石，现金的流入瓦解了旧的自

^① 关于“部落”和“部族”等术语的使用问题，曾引起中国非洲学界的争议。李安山先生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强调指出20世纪后期西方和非洲学界已经不再使用tribe（tribal）这样的词汇，而改用ethnic group取而代之，中国学界应避免使用类似已被抛弃了的学术用语。详见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类似的还有“土著”（native）一词的使用问题。本文中偶尔出现的“部落”和“土著”等词皆为引用70年代前原著中的用语[“tribe\（tribal\）”和“native”]。

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不断上升的消费需求则使前资本主义的维生经济背上了难以忍受的负担。^①同样，汉考克（Hancock）也将土壤侵蚀和非洲土著的困境归咎于“欧洲人给土著留下的土地太少”，无法促使黑人劳动者或白人农场上的“擅自占地者”以班图人的经济方式取得进步。^②保留地经济史研究专家霍巴特·休顿（D. Hobart Houghton）则从南非存在的“二元经济”理论出发，进一步阐述了“维生”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鸿沟。^③他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非洲人未能使其部落经济适应土地相对短缺的条件，或者从其白人邻居那里学到更现代的农耕方法。这种“经济适应的失败”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失败主要是由于传统或维生经济的缺点：缺乏技术知识，社会习俗的制约，以及由此造成的对革新的敌视，对市场刺激反应的迟钝。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南非经济学家富兰克林（Franklin）具体地列举了“这些自然的障碍”：土著对土地和牲畜的传统态度，保守主义，家庭纽带，忽视条件的变化和提供的机会。^④霍巴特（Hobart）和富兰克林一方面轻视了非洲人土地严重缺乏这一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过于从非洲人传统经济自身找原因；另一方面他们还忽视了莫妮卡·威尔逊（Monica Wilson）提请注意、邦迪（C. Bundy）重笔描述的这一事实：南非保留地地区和今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地区曾经历过“早期的繁荣”，随即又出现了欠发展和维生经济的症状。^⑤无论是否强调土地缺乏对南非土著农业的影响，从麦克米伦到邦迪，他们探讨的出发点是在承认既定的土地关系条件（即农民土地

① C. W. Macmillan, *Bantu, Boer, and Briton*, 1936; *The Making of 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Problem*, Oxford, 1963, revised edition, originally 1929, pp. ix-x, 74-75; C. W. de Kiewie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Native Tribal Lif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III, Cambridge, p. 812.

② C. W. de Kiewiet, 1937: *The Imperial Factor in South Africa*, Cambridge, p. 150; 1941: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Cambridge, p. 197; K. W. Hancock, 1941: *Survey of Commonwealth Affairs*, Vol. II, 'Problems of Economic Policy, 1918 ~ 1939', Part 2, London, pp. 25, 71, 17.

③ Hobart Houghton 关于保留地和二元经济的论述，参见 1938: *Som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Bantu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elations Monograph Series No. 1, Johannesburg; 1952: *The Economy of a Native Reserve of the Keiskammahoek Rural Survey*, Vol. 2, Pietermaritzburg; 196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 Cape Town, 以及其他相关著作。

④ N. N. Franklin, 1948: *Economics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p. 83.

⑤ M. Wilson, "The Growth of Peasant Communities",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p. 55; C. Bundy,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p. 3.

缺少或土地资源贫乏的情况)下,研究农村经济如何向工业经济转变,如何调整二元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农民的适应性问题,即以班图族为主的南非“部落民”如何在现代经济社会里生存和过渡到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许多作者的笔下,“前工业社会”和“原始社会”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他们常用的概念。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农民学兴起后,当代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既定的生产关系出发,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角度来审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贫穷问题。他们认识到“农民是构成发展中社会的决定性因素”^①,针对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历史和现实,对“农民”的定义和“农民化”进程做出了各种详尽的划分和解释。^②如沙宁(Shanin)认为构成一个“农民社会”需要四个特征:(1)农民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2)农耕是生活的主要手段,直接提供消费需求的绝大部分;(3)

① T. Shanin, 1971: "Peasantry: Deline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 and a Field of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 p. 290.

② 关于“小农经济”的宏观论述,早在20世纪初,便有俄国等人代表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的观点(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 A. Lewis)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的命题(参见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另外还有霍布斯鲍姆《历史上的农民》(E. Hobsbawm, *The Peasantry in History*, Oxford, 1980)。国外其他有关非洲农民的代表作如A. L. Kroeber, 1956: *Anthropology*, Chicago; R. Redfield,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Ithaca, N. Y. 1953: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 K. Post, 1972: "‘Peasantization’ and Rural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 Af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I; E. Wolf, 1966: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L. Fallers, 1961: "Are African Cultivators to be called ‘Peasants’?", *Current Anthropology*, II; G. Dalton,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Subsistence and Peasant Economies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XVI, 3; J. Middleton, 1966: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Survey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I, The Hague; J. S. Saul and R. Woods, "African Peasantries", in T.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1971; B. Galeski, 1972: *Basic Concept of Rural Sociology*, Manchester。类似的著作和文章还有很多。其中专门论述南非农民问题的有: M. Legassick, 1974: "South Africa: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Violence", *Economy and Society*, 3, 3, August; Monica Wilson, "The Growth of Peasant Communities",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II; H. Slater, 1977: "Peasantries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in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in Progress: Collected Papers*, 2, University of York; C. Bundy,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California, 1979; Timothy J. Keegan, 1986: *Rural Transforma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South Africa: The Southern Highveld to 1914*, Ravan Press (South Africa), 等等。李安山先生在其专著《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的第一章“导言”中,对中外农民学特别是农民反抗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高度概括。另可参见侯建新:《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

与小集体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4) 低贱的地位：受到别人的支配，包括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依附。^①有些学者专门论述了南非黑人“农民”的特征，如邦迪《南非农民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African Peasantry*)探讨了农民与其耕种的土地、作物、牲畜、工具和牧场的关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及其对新的贸易体制、价格和债务的利用；农民与约束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他对法律、政府和雇主的压力的反应，等等。邦迪认为，非洲黑人农民对经济变化和市场机会的反应比通常人们估计的要积极得多。从部落民到农民——或非洲人对市场机会的反应——既是研究的出发点，还要看到其后果——失败的结局。他由此得出结论：发生在非洲农村地区的欠发展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南非采取的形式密切相关。^②在笔者看来，上述学者们的分析无疑很深刻，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还具有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当然也很有现实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不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南非居民是不是“农民”，他们确实经历了邦迪所描绘的那种盛衰过程。在南非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或靠农业为生的南非黑人并不关心别人是否把自己当作农民看待，也不会忧虑所谓的“农民问题”。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现实生活中，首先是土地问题。在黑人学者中，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当属普拉彻 (S. Plaatje)。^③不过，他的《南非土著的生活》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调查报告，是被剥夺土地者的直接呼声。黑人女学者莱特索阿洛 (Essy M. Letsoalo) 的《南非的土地改革》更多是对 1910 年后阿非利卡人统治者所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农村政策的批驳。莱特索阿洛分析了非洲土地“公社所有制”和“酋长所有制”的本质，指出正是殖民经济剥夺了南非黑人的大部分土地，而白人却将保留地内的土壤侵蚀、农业凋敝归结为黑人传统的土地制度的落后，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土地制度，如私有化、确立产权关系等措施来提高产量，改变保留地内的状况，并因此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改革”。莱特索阿洛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摧毁了黑人本已很糟糕的经济，

① T. Shanin, 1971: "Peasantry: Deline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 and a Field of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 pp. 294 - 296.

② C. Bundy,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California, 1979, pp. 12 - 13.

③ S. Plaatje, 1916: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N. Y.

实际上还摧毁了黑人的传统文化,因而这种土地改革措施是不可容忍的。人们会问,这种土改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的损失孰轻孰重?事实已经表明,土改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且不说土地不多,即使法律赋予个人土地私有权,经济上的所得根本无法和文化上的所失相比。这实际上不能叫做土改,如果其中有反改革的内容,就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①

那么,阿非利卡人学者是如何看待南非的土地问题呢?他们大多有意无意地为统治者的土地政策辩护,同时打着为“土著”谋利益的幌子,寻求保留地内班图人的出路,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分别发展”。典型的如“汤姆林森(Tomlinson)报告”。^②这实际上掩盖了南非发展问题的本质所在。

笔者认为,影响南非社会稳定和经济、政治发展的因素很多,追根溯源,最根本的应该是南非有色人和黑人民族的切肤之痛——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固然是个重要问题,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从时间意义上,土地问题无疑具有本源意义。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事实上,历史学家们,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著名学者,在论述农民问题时,都不得不谈及土地问题。因为农民离不开土地正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如果没有土地,“适应性”再强的农民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南非土地问题的研究,除刚才提到的黑人学者反映本民族呼声的著作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做了大量的具体而细致的深入研究工作。^③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对南非土地问题的关注大多表现为进行政策研究和个案研究,着重分析某一时期和某一地点的某种

① Essy M. Letsoalo, 1987: *Land Reform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p. 6. Essy M. Letsoalo 的著作写于国外。在种族隔离制度盛行时期,由于政府的高压和学术的相对封闭,在南非国内专门探讨土地问题的论著并不多见。目前查阅到的篇目只有南非大学的 Patricia Allen Shifferd 写于 1979 年的“Trade, Land Expropriation, and Conquest: the Effects of European Contact on the Native of Africa and North America”通过与北美的对比论述了欧洲人的贸易、侵占土地和殖民征服对土著的影响。

②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ntu Areas withi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U. G. 61/1955, The Government Printer, Pretoria.

③ 据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博硕士论文收藏和供应商(ProQuest, UMI)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0 年,全世界有关南非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数已经超过 2500 篇,其中百余篇论及南非的土地问题。另外,据世界著名的网络书店亚马逊公司(Amazon)的书库目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南非土地问题的著作也已逾百部。

土地政策、土地制度或土地关系。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基兰库马尔·拉罗 (Kirankumar Laloo) 论述了南非的公民权、财产权和土地与住房之间的关系。^①加拿大学者马瑟 (Charles T. Mather) 以 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南非一个地区为实例论述了南非的农业变迁。^②英国学者赫勒纳·多尔尼 (Helena Dolny) 论述了南非土地和农业改革计划中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③法国巴黎大学的穆雷·维克多·勒布朗 (Murray Victor Leibbrandt) 对南非乡村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个案研究, 论述了南非农村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问题。^④瑞典的托马斯·亨德里克斯 (F. Thomas Hendricks) 认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就是对土地所有权、农村计划和酋长制的控制。^⑤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 南非国内的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学者们也开始涉足土地问题这一敏感的区域, 与西方学者一样, 他们也大多是从个案研究着手, 如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比勒陀利乌斯 (Pritorius) 对南非文达人居住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系统的社会经济分析。^⑥弗朗西斯·丹尼尔·科瓦姆·阿尼姆 (Francis Daniel Kwame Anim) 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南非西北省前莱博瓦 (Lebowa) 家园公社所有制下的土地所有权、信贷和农场投资的关系问题。^⑦罗伯特·弗雷德里克·汤森 (Robert Frederick Townsend) 的论文认为出口定向的政策对南非经济尤其是对农业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⑧还有不少学者则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探讨了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个案研究以小见大, 都从不同侧面触及了南非的土地问题。

① Kirankumar Laloo, 1998; *Citizenship, Property and Place: Land and Housing i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② Charles T. Mather, 1992;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 Land and Labour in the Barberton District, 1920 - 1960*, Queen's University at Kingston (Canada).

③ Helena Dolny, 1992;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South Africa: Land Ownership, Land Market and the State*. Open University (UK).

④ Murray Victor Leibbrandt, 1994; *the South African Land Tenure in the Light of a Village - Level Stud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⑤ F. Thomas Hendricks, 1990; *The Pillars of Apartheid: Land Tenure, Rural Planning and the Chieftaincy*. Uppsala Universitet (Sweden).

⑥ Diederik Daniel Pritorius, 1994; *A Socio -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ommunal Land Tenure System in Venda*. University of Pretoria.

⑦ Francis Daniel Kwame Anim, 1997; *Land Tenure, Access to Credit and On - Farm Investment under Common Property Arrangements*. University of Pretoria.

⑧ Robert Frederick Townsend, 1997; *Policy Distortions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i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etoria.